

◆◆大逃港◆◆

陈秉安 著

第四节 荷叶塘故事——一个地主后代的回忆

“孩子，如果你看到了这张条，就说明你出来了，妈妈已经没了，你的家也没了。你哥哥可能也到了香港了。你也赶快跑吧——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没让你们同你爸爸跑……”

得到他的允许，我公开这段故事。

1997年2月的一天，香港旺角一间酒楼里，十分热闹，不大的酒楼上，熙熙攘攘挤满了喝早茶的广东人。作者的表弟文嘉宁（左），曾在深圳白石洲下海偷渡时为狼犬咬伤、被捕，经多次涉险后逃到香港转居加拿大。

对面这位头发斑白的老人按辈分是我的表哥，名叫何增璜。原住湖南省桂阳县的何家巷，50年代从老家潜到深圳，然后偷渡到香港。

“大虎表哥不想回老家去看看？”我用小名叫他。还带着县里请港台人士回乡去办厂的“拜托”。

“不回了，不回了。”他摇着斑白的头，“回去做什么呢？什么都没有了。”有些凄凉。

半天，他忽然问我：“石板街还在吗？”似乎在想什么。

“还有，我家后门园里的石榴树，还在吗？红红的，这么大——”他拿手比划着，像当年爬在树上摘石榴的孩童。他想着他的家呢，这位离几十年的老人。

其实，他哪还有家？他家所有的砖瓦，都早在“大跃进”中被拆了建炼铁炉了。我的心便不觉有几分悲凉。他忽然停顿了一下，靠拢我，紧张地问：“还有，荷叶塘呢？还在吗？”他似乎很怕提起那个地方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我的家乡在湖南的南部，是个小县，名叫桂阳。县虽小，却出了一个全世界都有名的伟大人物，那就是蔡伦。也许是造纸的缘故罢，小县城的水井特别多，水也特别清甜。清清的小溪水，与长长的青石板街道平行着，构成了一道诗意的景观，一同向南缓缓“流”去……于是一些人家的门槛边，就会架上一道道弯弯的像桥一样的砖拱，用来过人。月牙形的，别致得很。

小溪的水流过了何家湾、七里街、洋行角……最后接上一片水塘。塘里长满了绿绿的荷叶，红红的荷花，都在夏天的风中一摇一摆，美丽极了。那便是大虎表哥问的他小时候抓鱼的地方：荷叶塘。

“在的，在的。”我只好告诉他。

他嘘出了一口气：“啊，在就好——不要破坏了。”

五十年前，美丽的荷叶塘附近，便是大虎表哥的家。

大虎家的房子很气派，门额上题着三个字：家风第。大虎的母亲，也就是我的五表姑，出身官宦门第，她算起来，应该是曾国藩的重孙辈了。五姑丈是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营长的。大陆解放前夕，国民党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。散兵游勇到处乱躲，五姑丈便失去了踪迹。

那一日，已经是深夜了，五表姑突然听到有人在窗口叫：“文琪、文琪——”

文琪是五表姑的名字。她一回头，便吃惊地看见窗口上露着一双眼睛：五姑丈回来了！

“哎呀，你还敢回来呀！”她赶忙开了门，把五姑丈迎进来：已经换了便服了。五姑丈背靠着门，却不进来：“快，收拾东西，快跟我逃！”



“逃？去哪里？”

“香港——大虎二虎呢？”

“在床上。”五表姑指着熟睡中的大虎兄弟。

“快叫醒他们——人家还在山后头等着。”

“人家”指的是准备一起跑的城里的几个大户。据说那次成功逃去香港的，还有桂阳城里“大北关”刘家两兄弟、县城姓李的国民党党部书记，还有一个少校军医、后来都住在香港的调景岭，一辈子没再回来。

熟睡中的大虎二虎怎么也叫不醒“你别叫这么声啊，外面听见啦——”姑丈很担心。

五表姑忽然想起，带着孩子是逃不了的，便催五姑丈：“你逃吧，他们能拿我母子怎么样？又没做坏事。”

话还没完，就听到有人撬前厅的大门——是民兵！五表姑一把就把丈夫往后门推：“快跑！”两人转身就到了后门。

走到墙边，五姑丈爬上了梯子，泪珠就掉下来了：“但愿菩萨保佑你们没事。今生不知还有没有再见的日子！”说完，翻身就出了后院的墙。从此跑了香港。

等两个端着枪的民兵进来时，五姑丈已经逃远了。“为什么不开门？”民兵问。

“我没听见。”五姑扣着衣襟说。但梯子是来不及搬了。

“呀——后墙还有梯子呢！”一个民兵在后院发现木梯。五表姑因此被抓去派出所关了一个月，从此成了日日被“批斗”的对象。

我至今还记得五表姑被游斗的情形。一长串衣衫槛褛的队伍，从石板街道的尽头上走过来了。队伍中的人，用一根长长的麻绳串在一起，像孩子手吸的一串大蚂蚱。民兵拿着竹片在后头吆喝着：“走！走！”如同赶牲口。

五表姑就跟在这行列中，胸前挂着牌子，上头的红叉里写着：地主分子陈义琪。她低着头走。头发有一半已经花白，身上的蓝布衣却十分整洁。她的手里拿着一根筷子敲着一个破热水瓶。走几步，后头的押解人就在她的头上拍一巴掌警告：“敲响点！”于是，筷子敲着破热水瓶的“念经”声，便响得更高：“坦自从宽，抗拒从严”她自念。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。”她依旧自念。“打倒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家属陈文琪。”她还是自念。

有时母亲隔着窗口，看着从石板街上走过的“地主婆”队伍，会惊慌地关上窗子：担心这“风”也会吹到我们家里来。然后着急地对父亲说：“文琪呀，怎么旧社会的习惯还不改呀，都押着游街了，还穿得那么整齐，找死呀！”父亲不做声。他本身就很危险。

“游街”结束的当晚，大抵都是“斗争会”，由居民小组组织。晚饭过后的时间，长长的石板路上，便回响着铁皮喇叭筒的喊声：“各家各户注意了！今天晚上，在三厅屋开斗争大会。”

顺便说一句，这种“斗争会”是可随意举行的，主要用来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。比如居民工作碰到了困难、修马路的任务完不成、“除四害”还欠着数字……那一定都是“四类分子”（地、富、反、坏）搞的“破坏”，可以搞一次“斗地主”来“促生产”。

至于那天的“斗争会”斗哪一个，也是随意的。看居民组长的喜好而定，如同抓出关在笼里的鸡。厅屋的地下用木柴架着，烧着一堆大火。火堆旁，密密麻麻坐满几十个街邻。古街邻居，年年结亲嫁女的，如果照人们血缘看，四分之一都是五表姑的亲戚：或是叔伯舅舅，或是表弟表兄。但是，这



些曾经亲亲热热，一张凳上磕瓜子的街邻亲戚，开起斗争会来，个个像是有深仇大恨，争着“大义灭亲”！

“陈文琪站出来！”喊五表姑出来的，正是她的远房表妹，居民小组长。

五表姑就站出来了，在一圈“群众”中勾着头……火山爆发般愤怒的口号声：“打倒反动分子陈文琪！”“陈文琪老实交代！”“快说！你是怎么放走伪营长老公的！”

“我上次已经交代过了。”五表姑回答，语气很硬。

有人尖叫：“你同反革命老公有没有联系？”

五表姑反问：“人都跑香港了，怎么去联系呀？”

“呀，还不老实啊！”这里“老实”其实是“驯服”的意思。

“这是要打！”就有人愤怒地叫着，正义地从队伍中跳出来，对着五表姑就是一耳光！“打得好！打得好！”人群中有人叫好——打人的正是准备入团的街邻秀秀。

“端渣子来呀！”秀秀声嘶力竭地叫着。就有人端了一箩炉渣子进来，“噗——”地倒在地上，锋利的渣尖向上朝着，像张着口。

“跪下！”秀秀在五表姑后头推了一把，她便“哎哟”一声惨叫，双膝已经跪在了炉渣上……鲜血从她跪着的膝盖边——自然会有人把她的裤腿挽上去的——流出来。

终于，一个小时后，五表姑晕死在地上了。于是，有人把关在屋里的大虎二虎放出来，让他们把母亲背回去。主持人也满意地宣布“斗争会很有成效”，大会结束，明天上水库。

餐桌边的大虎擦着眼泪对我说：“他们就是这样折磨我无辜的母亲。母亲怕我们多事，晚上回来，还安慰我们兄弟说，没啥，这年头，挨斗的人多呢。运动过了就没事了，平安了。”

不过，五表姑的这个希望也破灭了，不久，小虎就出事了。

我同小虎在初中是同班，所以他出的这事我前后都清楚。那是一天快放学的时候，教室里突然进来了面色严肃的校长和班主任，而且后头还跟了比他们更严肃的公安。

我很快感到气氛不对。“今天下午，有哪些同学进厕所了？”

问得太突然，被恐惧笼罩的教室中，几十个小脑袋木木地竖着，像水面的一根根桩。一片死寂。

“听见没有——进了厕所的站起来！”校长气愤得涨红了脸。

我的身后站起来四个同学，其中就有小虎。

“你们都在那做什么了？”校长问。

“拉屎……”其中一个大点的怯怯地说。要是平时，这种回答一定会在教室中引起哄堂大笑，但这次没有。整个教室静悄悄地，紧张得像落下一根针都可以听见。

“我也是。”“我也是拉屎。”其他二个都说。

“拉屎？谁在厕所里写字了？”校长问。四个学生都互相望着，没有人承认。

“这是谁的？”黄军装公安拿出一张作业纸来，举过头顶，上面用钢笔写着几个字：“苛政猛于虎也。”

这不是我们正学着的《孔子过泰山侧》中的话吗？



“还要顽固吗？”这回是公安问，态度倒平和，眼光在四人中扫射。慢慢集中在小虎的身上，不动了。

“我……我，”小虎声音在颤抖，“我，错了——”两行眼泪从他脸上流下来。

“说得轻松，”公安说，“带走！”就有另外两个公安跑上来，抓住了小虎，像抓着一只小鸡往教室外头去。我听见小虎在被架出去时叫着：“我不是啊，我不是啊——”

我至今不懂小虎最后说的“不是”是什么意思。是不是说他只是随意写上的，并没有“反动”的意思。后来知道，是去了厕所的团支书到校长室报告的，说在厕所里发现“反标”。那团支书后来被“录取”到省城的高中。

当年学校的厕所很简陋，只是一层木板楼。排着十几个锯出了粪洞的格子，用木板隔开。“反标”——就是那张作业纸，被人贴在格子中的板壁上。“作案”工具是钢笔。字迹显然是小虎的，更有小虎被撕去一页的作业本为证。

那时，我弄不清，孔子过泰山侧干吗要说那些话？我更弄不清，小虎把那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作业纸贴在厕所中，究竟有什么意义？

事情最后被定性为“反革命”案件。十五岁的小虎被关进了监狱，接受共和国法律的判刑。

这究竟是无意的，还是“阶级斗争情结”的发泄？今天想来，恐怕的确是后者。世上本应无“仇”，本应无“斗”。仇恨却因为煽动，你要斗我，我也斗你，越煽越烈。小虎最后被判了十年徒刑。

但是，犯人才15岁，“阶级报复”得要被证明“有人指使”才顺理成章啊。当然，“指使者”便是他的母亲和哥哥了。五表姑和大虎也同时被捕，关押了半个月，追查同“反动标语”的关系。从此，十七岁的大虎就被共和国“内部监控”起来了——照规定：凡不满十八岁的青少年，如其直系亲属中有被无产阶级专政“关、管、杀”者，他本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进入无产阶级政权的秘密“监视”之列。这在《公安条例》中称为“十六种人”——直到后来宣布“阶级斗争”的错误才取消。

“你们进十六种人了，不能乱说乱动，知道吗？”公安指着两母子：“要互相监督，互相揭发。谁敢于揭发，准改造得好，谁就早解放。”

香港的酒楼上，大虎在继续往下说：“事情在慢慢起着变化，二虎关进去以后，一个夜晚，我刚修水库回家，母亲把饭端到我面前，看我吃着，突然说：大虎，你逃吧。”

逃？大虎一时还不明白她的意思。“逃香港，找你爸爸去”。

大虎迟疑了一下，问：“不，我要走了，你怎么办？他们会找你的。”

“娘都快五十的人了，他们能拿我怎么样？”五表姑说。

“不，我不能走。”大虎搂住了娘，“现在就剩咱娘俩了，要死咱娘俩死在一块！”昏黄的灯光下，大虎的眼泪滴落下来了。

几天以后，居民小组派大虎到离城二十里地的地方去修水库。这是个大晴天，清早起来，大虎吃了一碗母亲准备的甜酒，背起行李和锤子同几个一起干活的青年上路了。阳光暖暖地照着，拱桥下的绿水轻松地唱着歌。“走到那条石板路的转弯处，也就是在离荷叶塘不远的地方，突然我想回过头去……看一眼我的母亲”大虎声音哽咽。

“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平时我出门，全不是这样的，难道这就是心灵感应？这时，我发现母亲也站在窗口望我呢……”“没想到这就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。”老人的泪水溢出了眼眶。



两天后的傍晚，四个孩子到小城外的荷叶塘游水。昏暗中，有人看见水面浮上来一大块东西，还以为是一段木头，就用竹竿去捅。等游过去看时，才发现是一具尸体。五表姑是抱着一块石头沉到塘底的。她学过游泳，担心自己沉不下去。没有人看见她投塘。

只是在前一天黄昏，有人看见她穿得干干净净，把门锁了，提了一桶衣服，往荷叶塘洗衣去。尸体扔在塘边上，很久没有人敢管。据说公安并没有去——死的只是一个地主婆，用不着去的。也不会有人去追究她为什么会自杀，地主婆自杀是常有的事。

事情传出去，小县城还是有了议论，都说是畏罪自杀。“大约是还有没坦白出来的吧。”革命人民怀疑。“八成，那写反标的事，同她也有关。”更有人定说。

得到凶讯的大虎是第二天才从工地赶回来的。公安局表现出人道，同意让狱中的小虎也由人拿枪跟着出来，看他的母亲一面。两兄弟于是得以相聚。先是抱着母亲湿漉漉的身子哭，后来是兄弟抱在一起哭，再后来是跪在地上哭。两兄弟求一位路边的老奶奶为母亲换下湿的衣服，这是做儿子的没办法做到的事。

天上的乌云聚积，两兄弟求人的头磕得地皮“嘣嘣”地响，天地动容！街邻都只是远远地围成一圈看着，不敢走近，更不敢同他们搭话。

三天后，回到工地的大虎就从水库上跑了，毫无牵挂地踏上了偷渡香港的路——找他父亲去了。

逃跑前他还打伤了一直盯着他的烧石灰的伙伴——在五位派去修水库的青年人中，有一位是被公安局交代了任务，要监视“十六种人”的大虎的“哥儿们”。

“我命大，过河很顺利，也没遇上警犬，很快就到了香港。”大虎说，“我明白了母亲的意思：只有她死了，我才会下决心跑！”

当然，此后，大虎再也不可能知道他逃跑后家中发生的事了。两地隔绝，没有人会传给他家乡的音讯。

“你是78年才出去读书的吧？”大虎哥问我，我点点头。

“后来我家的情况，你清楚吗？”我只好摇摇头，我能说什么呢？其实，“家风第”第三天就被政府收走了。后来改住了一户姓葛的商业局的干部。据说半年后，干部的妻子无意中在旧的壁缝里发现了一张纸条，是五表姑留下的，信交给政府了。是五表姑留给小虎的，其中有这样的话：“孩子，如果你看到了这张条，就说明你出来了，妈妈已经没了，你的家也没了。你哥哥可能也到了香港了。你也赶快跑吧——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没让你们同你爸爸跑……”

那干部的妻子是位小学教师，有文化的。她后来告诉别人：“到底是读过书的，一笔好娟秀的字啊，竖着写的！”

大虎表哥在东莞办有三间电子厂，有一千多名工人。桂阳县里的外经部门做了许多工作，想请他回家乡去投资办厂，帮助家乡解决年轻人就业的问题。他始终没有去。我去做工作也没用。2007年4月17日，大虎病逝于香港观塘。

